

从史志目录看学术变迁

——以楚辞类文献为例

裴芳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重庆 400044)

摘要:史志目录是目录学的一大分支,因其体例较完备,著录较审慎,内容较丰富广泛而备受重视,它与学术变迁可谓息息相关。通过对比剖析其对楚辞类文献的著录情况,不难发现东汉、宋、明、清是我国《楚辞》研究的辉煌期。东汉的《楚辞》研究集中在章句注疏与绍骚之作,宋代则以义理、疑辨为主,明代是《楚辞》研究的深化与开拓时期,清代则是音义、考据、图谱等多元化全面化研究的最高潮。此种变迁充分体现了史志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用。

关键词:史志目录;学术变迁;楚辞

中图分类号:I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8)05-0068-05

史志目录是目录学的一大分支,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有关史志目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正史中缺少的艺文志进行补著或考证;二是考察史志目录的产生背景、著录标准、编纂思想、学术价值等;三是以其为工具,通过历代史志目录的著录变迁,考察学术流变。前两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第三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赵元芳的《史志目录表现出的道学嬗变》、谭宝刚的《从史志目录所录道家文献看道家学术发展概况》等。赵文简要分析了历代史志目录著录道家文献数量的多寡,指出了道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嬗变,但对后人的补志涵盖不甚全面,对各期的道学发展一笔带过。谭文注重细节考察,主要通过对比《汉志》《隋志》与新旧《唐志》中道家文献的著录情况,指出了道家学术在周秦两汉及隋唐间的变化,基本勾画出了道家学术在唐以前的变化,但对唐以后无涉及。他们的研究虽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但其材料的运用、对比的细致对笔者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本文以楚辞类文献为切入点,梳理历代史志目录对该类文献的著录情况,通过横向与纵向的对比剖析,勾勒出楚辞学的学术变迁。

一、史志目录的含义

关于史志目录的定义,学界尚无定论。笔者查

阅目录学的相关专著与学术论文,发现对其定义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要有以下代表性观点:

其一,史志目录只指正史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如徐召勋在专著《学点目录学》中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列入史志目录^{[1]17}。谭宝刚在论文《从史志目录所录道家文献看道家学术发展概况》中提出:“史志目录是指纪传体史书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2]59}

其二,史志目录指正史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后人的补志。如董洪利在《古典文献学基础》中指出:“补志与史书中原有的《艺文志》(《经籍志》)连在一起,成为一套完整的史志目录。”^{[3]166}

其三,史志目录指正史、国史、政书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后人的补志。该观点具有相对广泛的认同性,诸如姚名达、张舜徽、来新夏、张三夕、周少川、程千帆、徐有富、冯浩菲等学者都持此观点。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史志篇》涉及正史艺文志、国史艺文志及政书艺文志,他将史志目录总结为“多附丽于史籍以行”^{[4]168}。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指出,史志目录包括正史中原有的、后人补注

收稿日期:2018-06-03

基金项目: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经学视野下的明代《诗经》图谱研究”(CYS17034)

作者简介:裴芳(1993—),女,河南安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

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考》等^{[5]117-121}。来新夏的《古典目录学浅说》提到，史志目录应包含正史艺文志、补志，“另外再加入国史目录和专史目录”^{[6]21}，这里所谓的专史目录即政书目录。张三夕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指出，史志目录“包括历代‘正史’中的或有些正史中原来没有而由后人补修的‘艺文志’（或称‘经籍志’），有些朝代的‘国史经籍志’，某些政书、专史中的目录等”^{[7]92}。周少川的《古籍目录学》指出，“史志目录包括正史目录、国史目录、专史目录和补史目录四部分。”^{[8]79}此外，相关论文也多认可该观点，如张子侠的《史志目录及其价值略论》与《论史志目录的类别及其特点》，张婷的《中国史志目录研究》，张小芹、张晓静的《论〈汉书·艺文志〉对史志目录的贡献》，司马朝军、黄聿龙的《论史志目录的书写方式及其学术价值——兼评〈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续编〉》，等等。

其四，史志目录指正史、国史、政书、地方志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后人的补志。杜泽逊是该观点的重要代表，他在《文献学概要》中指出，除正史、国史、政书“艺文志”或“经籍志”之外，“地方志中有《艺文志》或《经籍志》，有的是书目，有的是地方文献汇编。属于书目的如《山东通志·艺文志》《安徽通志艺文稿考》《湖北通志·艺文志》等，这些亦属于史志目录”^{[9]215}。一些文献学教材如杜道群的《中国古代文献学纲要》，杨燕起、高国抗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也持该论点。《中国大百科全书》亦依此说。

此外，郭侃在硕士论文《史志目录编纂思想研究》中提出，《清史稿·艺文志》、“国史经籍志”类目录和政书中的目录都不应归入史志目录^{[10]7-8}。但该观点并未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此处聊备一说。

综上，笔者认为史志目录有狭广二义：狭义上只包括纪传体正史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广义上包括正史、国史、政书、地方志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后人的补志。本文采用广义上的概念，以求更全面、更充分地考察楚辞学的学术变迁。由于本文拟关注《楚辞》研究的历时性变化，而非地域性对比，因此暂不述及方志“艺文志”。

二、史志目录中楚辞的含义

“楚辞”一词，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11]3143}何天行认为这里的楚辞是指当时的

“楚声”^{[12]2}，熊良智则认为它特指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而不是一般意义的楚人文辞”^{[13]363}。其实，这里的楚辞泛指楚地歌辞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史记》多用单篇之名称屈原之作，多用“赋”字称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之作。那么楚辞何时成为专名？学界多据王逸语“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14]48}，推断刘向辑录《楚辞》，且至迟在刘向那里楚辞已成专名。但是刘向是否辑录《楚辞》实为学术疑案，早在宋代已有人质疑。顾实先生及朱东润先生也对此提出过质疑。仅据王逸之言基本上可以断定刘向校书分十六卷，至于是否定名楚辞，尚待商榷。那么我们可以退一步讲，至迟在王逸那里“楚辞”成为专书，成为特指屈原、宋玉等人骚赋之作的代名词。

楚辞作为目录中的一个部类，最早见于梁阮孝绪的《七录》，其文集录著录“楚辞部五种五帙二十七卷”^{[15]10}。由于《七录》已亡佚，我们仅能据“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的《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来探讨“楚辞”的含义。《隋志》“楚辞”类小序言云：“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乱，诗人寢息，谄佞之道兴，讽刺之辞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抒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采，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16]1055-1056}这是目前所见史志目录中最早界定楚辞者，由此可推知，《七录》楚辞部的著录当与屈原等人创作的新诗体相关。那么作为集部类目之一的楚辞是否与《隋志》所定义的楚辞同义呢？其实不然，作为类目的楚辞具有更广泛的内涵与外延，是指“以楚辞为中心的分体文学总集基础上的有关楚辞研究的书目”^{[13]429}，这些研究是以《楚辞》这一专书为基础，对其进行注音释义、绘图评论等。而《隋志》所定义的楚辞则具有更丰富的文学性，一方面可以指专书《楚辞》，另一方面也指一种以屈原为代表的新诗体创作。

本文所言的楚辞不是文学意义上的，而是目录学意义上的，是在史志目录中作为集部类目的“楚辞”。简而言之，即与楚辞相关的书目，不仅包括对屈、宋之赋以及贾谊、东方朔等模拟仿作之赋的辑录，也包括从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对其进行研究的著作。另外，本文之所以选择楚辞类文献为例，主要在于其在史志目录著录中多处于集部之首，具有单独成类的特殊地位。

三、史志目录对楚辞类文献著录的演变

(一) 西汉: 初兴

在史志目录中,《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最早著录了楚辞类文献。它虽未列楚辞类目,却在“诗赋略”著录与楚辞相关的“屈赋之属”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其实,“屈赋之属”是楚辞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屈赋之属”与洪兴祖《楚辞补注》对照可知,屈原、宋玉、贾谊、淮南小山、严忌、王褒、刘向等人的赋作被部分或全部收入《楚辞补注》中。

但是史志目录难免存在误收、漏收等问题,清人对此做了很多考证、补遗工作。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就对《汉志》查漏补缺,在“诗赋略”补充与《楚辞》相关的书目四种:《楚辞》十六篇、刘安《离骚传》、刘向《天问解》、扬雄《天问解》。其中,《楚辞》十六篇当是辑录屈原等人赋作的书,或为《楚辞》的最早版本,其他三种对《楚辞》进行全文或单篇注释,单篇注释主要集中在《天问》篇。综合两种目录来看,虽然与《楚辞》相关的书目数量不多,但足以反映西汉时期《楚辞》得到一定的关注,关于它的研究正在兴起。

(二) 东汉: 章句之学与绍骚之作

由于《后汉书》本身没有“艺文志”,只能借助钱大昭、顾怀三、姚振宗、曾朴等学者的补志探讨东汉时期的史志目录对楚辞类文献的著录情况。不同的补志存在分类上的差异及书名、卷数著录上的不同,但对我们了解《楚辞》研究的概况影响不大。

综合几家补志来看,东汉的《楚辞》研究主要分两类,一是注释之作勃兴,章句之学突出。与西汉相比,东汉关于楚辞的注释不再专注于《天问》篇,而关注全文的篇章字句,如马融《离骚注》、班固《离骚章句》、贾逵《离骚章句》、王逸《楚辞章句》。二是出现较多绍骚之作,即对《楚辞》进行模拟仿作的篇章,如班彪《悼离骚》、梁竦《悼骚》、应奉《感骚》、王逸《九思》、崔琦《九咨》、服虔《九愤》、蔡邕《九惟》。此期的章句之作与绍骚之作在数量上存在一定差异,就顾怀三的补志来看,关于《楚辞》的章句之作仅有前述四种,而绍骚之作则有七种。或许我们可以据此推断东汉之时,仿作《楚辞》才是当时的主流,而注释仅是《楚辞》研究的一个分支。虽然仅据数量多少进行推断略显武断,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证实或证伪,有赖于学界的共同努力,以及地下新材料的出土。无论绍骚之作在东汉是不是主流,在《楚辞》学史的叙述中都应该占一席之地。

(三) 魏晋南北朝: 注音之学与考证之学

此期的正史缺少“艺文志”,也要借助丁国均、秦荣光、黄逢元等学者的补志探讨楚辞类文献的著录情况。通过补志可知该期的楚辞研究专著数量不多,但领域却相对广泛,主要集中在对《楚辞》进行注释、注音及考证三个方面。如郭璞《楚辞注》三卷、何偃《楚辞删王逸注》十一卷以释义为主,也偶尔涉及注音;徐邈《楚辞音》一卷、诸葛氏《楚辞音》一卷则以注音为主;刘杳《楚辞草木疏》一卷侧重于对《楚辞》中植物的考辨。

和东汉相比,该期的《楚辞》研究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继承性主要体现在《楚辞》注释方面,受东汉章句注疏影响极大,如何偃之作直接来源于王逸。创新性主要体现在《楚辞》注音与考证方面。注音之作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时人对《楚辞》读音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受到佛教传入中国的客观影响。考证之作的出现表明其中的动植物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反映了《楚辞》研究的细密化趋向,拓宽了《楚辞》的研究领域。但除郭璞《楚辞注》经王重民、闻一多、胡小石等人的勾稽考证已略具轮廓外,其他著作都已亡佚。

(四) 隋唐: 中落

该期楚辞类文献的考察主要借助隋唐原有的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正式确立了经史子集的四分法,将楚辞类列于集部之首。其实《七录》已将楚辞类单列,对此徐有富先生解释道:“不是因为它多,而是因为它出现的时代早,风格独特,内容也和一般的诗赋不同。”^[17]那么,《隋志》将楚辞类单列或是因袭《七录》,或是由汉至隋《楚辞》研究发展的必然。

《隋志》楚辞类著录十部书,其中王逸《楚辞章句》、郭璞《楚辞注》、徐邈《楚辞音》一卷、诸葛氏《楚辞音》、刘杳《离骚草木疏》为前代著作。孟奥《楚辞音》一卷与不知撰者的《楚辞音》一卷已不可考。杨穆《楚辞九悼》一卷也不能确考,姚振宗“疑即梁竦《悼骚》,而杨穆为之注欤?后周有杨穆,字绍叔,弘农华阴人,仕至车骑将军、都督并州刺史。附见其弟杨宽传。不知是否即此杨穆也”^[18]1631-1632。因此,能够确定为隋代著作的仅有“殆取王逸、郭璞、何偃三家注本,而参考为训解”^[18]1632的皇甫遵《参解楚辞》七卷及释道骞的注音之作《楚辞音》一卷。

相比《隋志》,唐代史志的楚辞类不仅没有新增书目,反而少了皇甫遵《参解楚辞》、诸葛氏《楚辞音》及未著撰者的《楚辞音》。这种不著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它们在唐代已亡佚及此期的《楚辞》研

究趋向中落。

此外,隋唐史志目录著录的七部书也存在书名、作者、卷数的差异。如《隋志》著录刘杳《离骚草木疏》二卷,而《旧唐书·经籍志》则著录刘杳《离骚草木虫鱼疏》一卷。这种差异或是抄写之误,版本差异,书卷部分亡佚,时代不同分卷标准不同等综合因素导致的。

(五)宋:兴盛与疑辨

根据《宋史·艺文志》(以下简称《宋志》),焦竑《国史经籍志》,黄虞稷、倪瓒《宋史艺文志补》,吴騞《四朝经籍志补》等对楚辞类文献的著录可知,宋代的《楚辞》研究主要集中在注释、考证与拟作三个方面。洪兴祖《补注楚辞》、周紫芝《竹坡楚辞赘说》、朱熹《楚辞集注》、钱杲之《离骚集传》、林应辰《龙岗楚辞说》、杨万里《天问天对解》等为注释之作,在匡正旧注方面多有创见。洪兴祖《楚辞考异》、朱熹《楚辞辨证》、吴仁杰《离骚草木虫鱼疏》及谢翱《楚辞芳草图谱》等为考证之作,多所发明。高似孙《骚略》是模拟《楚辞》的作品,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朱熹《楚辞后语》则是对绍骚之作的再辑录。另外,在注音方面宋人也有发明,黄铢《楚辞协韵》反映了“叶韵说”在《楚辞》音韵研究上的运用。虽然“叶韵说”任意改读韵脚未必符合楚音实际,但对后世研究《楚辞》音仍有借鉴意义。

宋代的《楚辞》研究具有极强的疑辨色彩,他们怀疑《楚辞》的注文,甚至正文。如朱熹《楚辞辨证》对《楚辞》旧注进行考辨。洪兴祖《楚辞考异》对王逸注文及《楚辞》正文进行考订。晁补之《重订楚辞》《续楚辞》《变离骚》是对原有《楚辞》的质疑,重新编订《楚辞》篇目,将与《楚辞》类似的骚体诗辑入《续楚辞》,与《楚辞》风格更为疏远的骚体诗辑入《变离骚》。他的标准或许不完全合理,但这是一种学术尝试。这种分类方式丰富了楚辞的研究内容,拓宽了楚辞研究的领域,影响了后世注重辞赋辨体的学术风气。

另外,《宋志》总集类也著录了三部与《楚辞》相关的著作,“王逸《楚辞章句》二卷,《楚辞释文》一卷,《离骚约》二卷”^{[19]5393}。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它们为何不著录在楚辞类目下,此“王逸”是楚辞类目中的“王逸”吗?关于此三书入总集,余嘉锡先生断言“必因北宋《国史艺文志》之旧也”^{[20]279}。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过于绝对,或许是撰者误著,或许是基于《楚辞》总集性质的新认识而有意为之。由于没有足够的文献证据,对该问题也只能提出一些猜测。关于此处“王逸”主要有两说,以百衲本为

底本,以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和清光绪元年浙江书局本为参校本的中华书局1997年版《宋史艺文志》认为是“王逸”,其《校勘记》曰:“原作王勉,据《隋书》卷三五、《郡斋志》卷一七、《玉海》卷五四改。”^{[19]5412}陈乐素亦认为当为“王逸”^{[21]582}。余嘉锡、姜亮夫则认为当为“王勉”^{[20]277}。笔者认为,此处为“王勉”的可能性更大。首先,百衲本与殿本所载皆为“王勉”;其次,中华书局改写的依据不足,他们是从《楚辞章句》这一书名出发,通过他校指出其作者是“王逸”本无可厚非,但也有另外的可能性,即不同的作者可能有同样名字而内容不同的作品,诸如徐邈、诸葛氏各有《楚辞音》。最后,此处三书当为一人之作,而王逸并未著《楚辞释文》《离骚约》,且其《楚辞章句》已在“楚辞部”著录。

(六)辽金元:衰落

辽金元时期的《楚辞》研究处于低潮,大多补志并未著录楚辞类文献,只有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骚赋类著录元代的三部相关著作:刘庄孙《楚辞补旨音释》是注释之作;吴莱《楚汉正声》二卷辑录宋玉、司马相如、扬雄、柳宗元的赋作,是对绍骚之作的辑录;吾衍《九歌谱》是与《楚辞》相关的图谱学著作,是元代对《楚辞》图谱学的关注。

(七)明:开拓与深化

通过张廷玉《明史·艺文志》,万斯同《明史艺文志》,嵇璜、刘墉等撰《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等史志目录所载楚辞类文献,可知明代的《楚辞》研究集中于注音释义、考证、模拟仿作及评论几个方面。

明代的《楚辞》研究一方面继承前代,如汪瑗《楚辞蒙引》《楚辞考异》,屠本峻《离骚草木疏补》,张之象《楚范》《楚骚绮语》,黄省曾《骚苑》之类的考证之作,与宋代考证之作类似,考订《楚辞》异文与注文、辨证文义。另一方面,明代的《楚辞》研究相较前代有所发展与深化。在注释方面,多博采众长,引证丰赡,提出“怀沙”是“哀郢”之类,《九歌》是汉魏乐章乐府之类的创见,如林兆珂《楚辞述注》、赵南星《离骚经订诂》、汪瑗《楚辞集解》、黄文焕《楚辞听直》等。在音义研究方面,陈第《屈宋古音义》破除宋代以来的“叶韵”说,对《楚辞》古音进行了严密考证,对后世音韵学的发展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在绍骚之作上,张燦《拟离骚》、黄道周《续离骚》《騷骚》等竭力扩展《楚辞》的题材内容,将孝子事亲之情类比屈原忠臣事君之志。在评论方面,明代出现沈云翔《楚辞评林》、屠本峻《读骚大旨》、黄文焕《楚辞合论》、陈山毓《赋略》、俞王言《辞赋标义》等。尤其是《赋略》与《辞赋标义》选录了屈原以来的辞赋

诸篇,加以评点,对辞赋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历时性梳理与概括。

(八)清:繁荣与辉煌

与明代相比,清代的《楚辞》研究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实现了飞跃性突破。笔者通过《清史稿·艺文志》《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志》《清朝经籍志》《清朝艺文志》等史志目录查阅到清代楚辞类著作共四十四部,按照姜亮夫先生《楚辞书目五种》可归为辑注类二十九部、音义类七部、考证类四部、图谱类三部、评论类一部。其实,清代的《楚辞》研究专著常集注音、释义、考证、评论于一体,尤以考证见长。如蒋驥《山带阁注楚辞》,王夫之《楚辞通释》,戴震《屈原赋注》《通释》《音义》,朱骏声《离骚补注》,毛奇龄《天问补注》等都为材料翔实、考证严谨的注释之作。因为这些作者多以小学名家,长于文字、音韵、训诂,所以在《楚辞》研究上综合运用小学知识,网罗材料,以考证文字的本意、名物的变迁,力求接近《楚辞》本意。在注释过程中也不乏评论之语。

清代的《楚辞》研究还呈现出多样性与专题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最具特色者当为《楚辞》图谱的绘制及注释。清代史志目录著录的《楚辞》图谱最多,共三部,分别为钦定补绘《离骚全图》二卷、萧云从《离骚图》一卷、卿彬《楚辞会真》一卷。可见在清代不仅文人学者研究《楚辞》图谱,甚至统治者也十分重视这一研究。其次,《楚辞》的专篇研究丰富,主要集中在《天问》《九歌》。如毛奇龄《天问补注》,屈复《天问校正》,李光地《九歌注》,顾成天《九歌解》等,推进了《楚辞》单篇研究的纵深化。再次,清代的考证不局限于《楚辞》中的草木虫鱼,而扩展到屈原及其他人物。如陈旸《屈子生卒年月考》一卷,俞樾《楚辞人名考》一卷。关于屈原生平的考证在一些注释之作中常有涉及,但对屈原之外其他人物的关注一直不足,《楚辞人名考》一书则对那些被忽略的人物加以关注。最后,《楚辞》音义领域的研究推进了音韵学理论的发展。如江有诰《楚辞韵读》遇到无直音字时用切音注音比陈第《屈宋古音义》用音近字注音更为准确;同时他以《楚辞》韵字为材料考证古有四声及古有通韵、合韵之说,对音韵学理论的健全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结语

通过梳理历代史志目录著录的楚辞类文献,可知隋唐、辽金元是《楚辞》研究史上的低谷,而汉宋、明清是《楚辞》研究史上的高潮。这样的结论在一

些楚辞学史专著中也可轻而易举找到,那么借助史志目录探讨《楚辞》的学术变迁又与那些楚辞学史有何不同呢?这主要表现在一些楚辞学史有所忽略的三个方面:首先,绍骚之作在东汉与明代的《楚辞》研究史中应占一席之地,尤其是东汉。因为就史志目录著录而言,东汉绍骚之作的数量要多于注疏之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对《楚辞》的模拟仿作是当时重要的学术活动。其次,《楚辞评林》《读骚大旨》《楚辞合论》等是《楚辞》评论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楚辞》学术史中也应得到重视。第三,元代吾衍《九歌谱》,清代《离骚全图》《离骚图》《楚辞会真》等是《楚辞》图谱学方面的重要作品,在《楚辞》学术史中也应占据一定地位。

参考文献:

- [1]徐召勋.学点目录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 [2]谭宝刚.从史志目录所录道家文献看道家学术发展概况[J].兰台世界,2009(22):59-60.
- [3]董洪利.古典文献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4]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5]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6]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
- [7]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8]周少川.古籍目录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 [9]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
- [10]郭侃.史志目录编纂思想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4.
- [1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2]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M].北京:中华书局,1948.
- [13]熊良智.楚辞的艺术形态及其传播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14]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5]释道宣.广弘明集[M]//中华书局编辑部.四部备要.北京:中华书局,1936.
- [16]魏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17]徐有富.目录学与学术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18]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M]//王承略,刘心明.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 [19]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0]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21]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于 湘]